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學刊 23（2）：129–152，2025

臺灣小馬遺址C5P1個體是尼格利陀人或傳說小黑人之異議*

邱鴻霖
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陳叔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人類學組

日治時期開始，學者對於臺灣各原住民族傳說中的小黑人是否真實存在，即議論紛紛。2022年洪曉純等學者經由研究小馬遺址C5P1人骨，斷言傳說小黑人確實存在。洪氏等從民族誌、顱骨測量、身高推估以及碳14放射性定年，認為小馬人骨是屬於距今6000年前居住在海退期廣大巽他大陸上的尼格利陀人族群，早於臺灣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先祖的人種，並認為藉此證實了臺灣原住民各族傳說之中的小黑人確實存在。這個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受到國內外學界與大眾的高度關注。本文對此論述提出異議，冀望透過本文的再推理與驗證，說明該研究推論尼格利陀人以及傳說小黑人存在於古代臺灣的關鍵誤謬。

本文藉由方法上的「邏輯推理」與研究對象本身的「證據論證」來重新檢視洪2022文之研究可信度。尼格利陀人（Negrito）一詞有其特殊的歷史與地理脈絡，而臺灣諸原住民中的小黑人傳說，則缺乏直接的民族學、語言學或考古學證據；因此洪氏等學者透過單一個體且保存狀況不佳的人骨證據，推論實際存在的尼格利陀人，再推論至屬於傳說的小黑人，欠缺嚴謹的邏輯推理過程。證據方面，本文也重新檢視考古出土脈絡與年代、身高推

投稿日期：2023年12月25日　接受出刊：2024年9月11日

* 本文於用詞上，清楚區分在東南亞真實存在，但臺灣未曾發現的Negrito人（中譯：尼格利陀人），與原住民族各族傳說中的小黑人／小人／矮人／矮黑人（以下統稱傳說小黑人）。本文不混用以上兩名詞，若引用文獻混用則依作者書寫內容呈現。

估、病理特徵、儀式性拔齒、古環境等證據，從「證據論證」的角度提出質疑與進一步反思。期望能對看似「確證」且廣受關注的研究結果提出反駁與探討。

關鍵詞：尼格利陀人，傳說小黑人，先陶時代，體質人類學，生物遺傳學

一、序言

臺灣原住民各族傳說中的小黑人／小人／矮人／矮黑人是不是真實存在？日治時期以來就是學者與民間關注的議題。2022年10月澳洲國立大學研究員洪曉純等學者6人，共同在*World Archaeology*《世界考古學》期刊上發表“Negritos in Taiwan and the Wider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New Discovery from the Xiaoma Caves”英文學術專論（Hung et al., 2022）。若將題目中譯，可譯為〈臺灣的尼格利陀人與更久遠的東南亞史前史：小馬洞穴的新發現〉（以下簡稱洪2022文）。洪2022文摘要中譯指出

> 臺灣東部小馬洞出土的顱骨測量研究，首次證實了6000年前臺灣的先陶時期，存在有身材矮小的狩獵採集者。這位女性個體與東南亞原住民，特別是呂宋島北部的尼格利陀人，有著顯著的顱骨相似性和矮小身高。本研究解開臺灣原住民族數百年來「小黑人」傳說之謎，並為更久遠的東南亞史前史帶來新的見解。[1]

此摘要清楚提示，洪2022文以「顱骨相似性」和「矮小身材」為主要證據，推論「小馬人骨是尼格利陀人＝傳說小黑人遺骨」。

這篇論文並非洪曉純推論臺灣真實有尼格利陀人／傳說小黑人存在的第一篇論文。2019年10月，洪曉純在《田野考古》上發表〈臺灣東部與菲律賓群島的史前人群交流–從舊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中文學術專論（洪曉純 2019，以下簡稱洪2019文）。文中提到：

1 原摘要為 ‘The cranial morphometric study of human skeletal remains unearthed from the Xiaoma Caves in eastern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validates the prior existence of small stature hunter-gatherers 6000 years ago in the preceramic phase. This female individual shared remarkable cranial affinities and small statur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Indigenous Southeast Asians, particularly the Negritos in northern Luzon. This study solves the several-hundred-years-old mysteries of ‘little black people’ legends in Formosan Austronesian tribes and brings insights into the broader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最近松村博文[2]與筆者就小馬遺址的頭骨進行復原和測量，結果判斷也是屬於澳美人的頭骨測量範疇，並且認為小馬人的體型特徵與現居於呂宋島的阿埃塔人（Agta）最為接近（測量結果尚待發表）。阿埃塔人即俗稱的菲律賓小黑人（Negritos），現存的人口很少，估計僅存15,000人。一般認為，他們應該是菲律賓舊石器時代文化的後裔。臺灣原住民的口語傳說裡常常提到小黑人或矮黑人，例如賽夏族的矮靈祭。臺灣是否曾有小黑人或矮黑人存在，是臺灣考古學和民族學長期以來關注的一個問題。因此，近期小馬洞的人種屬性的確立具有多項重要意義：一、臺灣的史前人群的組成和華南及東南亞地區一樣具有兩層結構（Two-Layers Model）。下層是舊石器時代以狩獵採集生活型態為主的澳美人種、上層是新石器時代之後以農業為主的東亞人種（或稱蒙古人種）；二、臺灣舊石器時代晚期（或稱先陶時期）的人群與東南亞地區，尤其是菲律賓北部，應該有所關聯；三、史前時代的澳美人種與新石器時代的務農人群（東亞人種）在臺灣的併存時間有多長還不清楚，但是可以確定澳美人在臺灣自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存在。」（洪曉純 2019：91-92）

洪2019文預告相關證據仍在分析中，但已先假設：1. 小馬人骨是澳美人種；2. 菲律賓尼格利陀人（Negritos）是菲律賓舊石器文化人的後裔；3. 菲律賓尼格利陀人與臺灣傳說小黑人是同一人群（將Negritos中文直譯為「小黑人」）。以上假設並未提供完整驗證。

在洪2022文之後，洪曉純在2023年5月《科學月刊》上再發表了〈史前人骨遺骸研究科學印證臺灣的小黑人傳說〉（洪曉純 2023，以下簡稱洪2023文）。檢閱內容，洪2023文實為洪2022文的中文科普版。洪2023文以中文書寫更具體指出，現存東南亞尼格利陀人與臺灣傳說小黑人是同一人群。臺灣的傳說小黑人今已不存在，該論文亦指出藉由分析小馬C5P1人骨與現存菲律賓尼

2　洪2022文第二作者。

格利陀人的相似性，推論小馬人骨是臺灣傳說中曾經存在的小黑人遺骨。

以上三篇文章所稱的小馬人骨，乃指1988年臺大人類學系黃士強與陳有貝執行「東河地區遺址試掘及史前文化重建」發掘計畫時出土的C5P1人骨。該計畫於臺東縣成功鎮馬武窟溪北側的海蝕洞穴進行試掘，人骨墓葬發現於5號洞（C5）、探坑P1、第4層（先陶文化層130-200公分）、深度150-190公分處。發掘報告推論，人骨屬於先陶時期墓葬（黃士強、陳有貝 1990：7）。若年代與層位正確，這具C5P1墓葬至今仍是臺灣唯一的先陶時期人骨。

本文將針對以上三文中提出的論點，以「邏輯檢驗」與「證據論證」途徑，重新檢視並提出討論，其內容是否能有效推論小馬遺址人骨為尼格利陀人，甚至是傳說中的小黑人。

二、邏輯推理

（一）檢驗人群關聯性需要多方推理

洪2022文首先指出「C5P1個體是尼格利陀人」；接著指出C5P1個體所代表的「尼格利陀人是原住民族傳說中的小黑人」。此兩點，都需要進行邏輯推理。

要能夠正確推理史前人群與當代人群之間具有關聯性，需要有效的樣本，以及嚴謹的科學程序。要推論一個傳說人群的真實性，則更加困難。臺灣考古學歷經百餘年與數千個遺址的發現，加上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及遺傳人類學的佐證，今日才普遍相信，臺灣新石器時代人群，與當代南島語族先祖直接關聯。基於同樣標準，要驗證一個傳說人群的真實性，絕非一個遺址一具人骨可以達成。

尼格利陀（Negrito）一詞是西班牙語，語意是小黑人，係16世紀時在菲律賓活動的西班牙傳教士首先使用，其後被其他歐洲旅行者和殖民者使用，指菲律賓及島嶼東南亞島上身材較小、皮膚較黑的人群。相對的，對於非洲身材較小、皮膚較黑的人群，外界首先是以希臘語俾格米（Pigmy）稱之。但這些名詞都非學術名詞。但最基本的，這些人群都曾被親眼見到，甚至今日仍存在，

故沿用這些名詞，須推理其間歷史脈絡能否共量。

臺灣至今未曾發現尼格利陀人相關的考古遺址。雖然在論證邏輯上，尚未發現並不等於絕對不存在，但臺灣的考古或體質人類學資料中，無論是新石器時代出土的眾多墓葬（陳光祖 2020），或是日治時期體質人類學田野實測（陳叔倬、邱鴻霖 2024），亦未見尼格利陀人般矮小人群的紀錄。C5P1這具人骨是臺灣數千個考古遺址中，唯一的特例。

小黑人／小人／矮人／矮黑人更只存於原住民族各族傳說中，未曾被證實過。事實上，傳說中的小黑人，各族用詞並不同，泰雅人稱Tsikui-tsikui-makana-tohu（足立文太郎 1906）、布農人稱Saluso（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9）、鄒人稱Sayucu或Tsarihira（鹿野忠雄 1932）、卑南人稱Kikik（劉育玲 2015）、賽夏人稱Ta'ai（鹿野忠雄 1932）、邵人稱Shlilitun、北排灣人稱Ngetjubr、中排灣人稱Ngebrel（林瑞珠 2018）。語言學者李壬癸認為：「『矮人』這個名詞，各族的稱呼顯然都不同……，這些詞形差別大都相當大，不像是同源詞。這似乎意味著這些傳說是後起的，只是近幾百年來才有的，不是古南島民族幾千年就有的文化成分（李壬癸 1996：597）」。若語言學者所言屬實，則各族傳說中的小黑人，更像是不同來源、非單一共同來源。因此，將各族不同來源的傳說小黑人，簡化成全臺原住民族單一共同「傳說小黑人」，著實犯了邏輯推理上的謬誤。

過去臺灣學界普遍「單一化傳說小黑人」的邏輯謬誤。足立文太郎首先提出菲律賓的尼格利陀人可能在臺灣生活過的假說（足立文太郎 1906）。伊能嘉矩則對沙里仙族口傳的矮人存疑，該傳說指出矮人的眼睛不在頭部而在膝蓋，白天看不見卻擅於夜戰，並指出需要考古證據來證實（YI生1906）。鳥居龍藏提出體質人類學假說，指出各原住民族偶見個子小、捲髮案例，可能是曾與尼格利陀人混血的例子（鳥居龍藏 1907）。鹿野忠雄則提出陶罐與腳箍等物質文化證據，認為小黑人傳說並非空穴來風，但仍需要通過殘存人骨或語言加以證實（鹿野忠雄 1932）。針對鹿野忠雄提出的腳箍，陳奇祿認為是排灣族在來到臺灣之前的原鄉或途中，與尼格利陀人接觸所留下（Chen 1968）。李壬癸採集各族關於小人的傳說多則，但未曾收集到鹿野忠雄強調的殘存語言（李壬癸 1996）。楊南郡則是訪談南部原住民族矮人傳說，造訪謠傳矮人居

住過的石板屋遺址，假設矮人確實存在，但因缺乏科學證據無法證實（楊南郡 2010）。其他如小黑人與石棺、石板屋相關的報導與文學創作更是眾多（王家祥 1996, 2002；洪田浚 1993, 1994）。

但至今，學界仍未發現傳說小黑人的直接證據。各地發現的石板屋遺構，容易被不具考古學背景的民眾，誤認為是傳說小黑人住居。李匡悌在屏東滿州鄉與牡丹鄉調查時，發現許多石板屋遺址，乍看牆柱矮小，大多是被崩土掩埋的半地穴式結構，因此看起來室內空間矮小，被穿鑿附會而視為矮人屋。實際上，留下來的石質結構只是房子的基礎或腰牆，以竹木茅草向上搭建的結構已腐朽不復見，更有許多石板屋很明確是排灣族群相關的舊社遺構（李匡悌 2004, 2006）。許勝發亦指出，這也可能是同一區域有先後兩批集團移入，後到者將先到者（已離去）視為異族群並稱其為「矮黑人」，用來符合對入口低矮的石板建築居住者身型之想像（許勝發 2016）。以上學者也多意識到，證實傳說小黑人仍需要直接證據，最好的直接證據就是出土小黑人遺骨，即可從體質及遺傳上進行驗證。

尼格利陀人是真實人群，至今仍生活在東南亞多處。經由遺傳基因研究，能證明各地尼格利陀人雖有相似性，但也存在差異。尼格利陀人並非學術名詞，僅是對形態上又黑又小人群的統稱，因此世界各地皆使用尼格利陀（Negrito）來稱呼具此特徵的「異人群」。在東南亞，尼格利陀人被用來稱呼安達曼島、馬來群島、和菲律賓數個島嶼上的某些人群。他們除了矮、黑之外，另有捲髮、狩獵採集營生等共通特性。過去學界假設，東南亞尼格利陀人與非洲俾格米人（Pygmy）關係密切，但經由血清蛋白研究發現，菲律賓尼格利陀人與亞太人群的關聯性較高，與非洲俾格米人的關聯性較低（Omoto et al. 1978）。粒線體DNA研究則發現，安達曼島與馬來群島尼格利陀人都是首批遷入東南亞的人群（Thangaraj et al. 2005）。比較不同人群體染色體中5萬個單核甘酸多樣性分布，可發現馬來群島及菲律賓的尼格利陀人為第一批東南亞移民（The HUGO Pan-Asian SNP Consortium 2009）。針對不同人群體染色體100萬個單核甘酸多樣性分布，發現安達曼島、馬來群島、菲律賓的尼格利陀人之間雖有差異，但移除安達曼島樣本後，馬來群島與菲律賓的尼格利陀人並無差異（Jinam et al. 2017）。歸納以上生物遺傳分析結果，非洲俾格米人在外群，

安達曼島、巴布亞島與美拉尼西亞群島的人群關聯性較高，菲律賓、馬來群島的尼格利陀人則是另一群。因此，在描述尼格利陀人時，不應視為同一人群。

若說，菲律賓尼格利陀人與臺灣傳說小黑人有關連性，而許多原住民族傳說中又提到曾與傳說小黑人生下後代，則現今臺灣原住民族中應保有菲律賓尼格利陀人的特有基因。實際檢閱上述遺傳研究論文，臺灣原住民族各族普遍不帶有菲律賓尼格利陀人的特有基因，更不用說帶有安達曼島、巴布亞島或美拉尼西亞群島人的特有基因。因此，遺傳學證據上並不支持臺灣原住民族與菲律賓尼格利陀人有關連性。

（二）推理人群關聯性不能靠孤例

群體中的個體雖具有一致性，也具有差異性，所以在推論群體關係時，絕對不能倚靠孤例。強調孤例容易讓群體被簡化、刻板化，若該孤例又不幸與群體的普遍特徵存在明顯偏差，更會造成群體特性被以偏概全。足夠數量的樣本，才可以避免與母群體出現偏差，並可供重複檢驗，方能推論出有效的科學結論。

洪2022文要進行兩個推論，但用來推論的樣本，卻是孤例，甚至無實例。議題「C5P1個體是尼格利陀人」中，C5P1人骨是孤例。議題「尼格利陀人是原住民族的傳說小黑人」中，傳說小黑人更沒有實例。洪2022文未能通過有效的邏輯推理，證據方面更需要經過嚴格論證。

三、證據論證

（一）考古層位論證

發掘報告指出，C5P1人骨出土於先陶層之中（黃士強、陳有貝 1990）。洪2022文進行出土文化層的碳14定年校正，兩件貝類樣本測出年代為距今 6,189-5,920 B.P. 與 5,996-5,725 B.P.，符合先陶時期的年代。但本文再針對出土脈絡進行分析後發現，C5P1人骨應是生活在繩紋紅陶時期（甚至更晚），是在埋葬時向下打破埋葬於先陶文化的地層，致使當時推論該個體為先陶文化層所屬。

人在埋葬死者時，往往會往地下挖掘，打破當時生活面的地層。這時，遺骸的埋藏層位，會進入更早期的文化層。檢閱發掘報告，小馬洞穴遺址的先陶文化層距離地表130-200公分，130公分以上為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墓葬位於先陶文化層的中間位置，距離地表150-190公分。先陶文化層之下200公分以下為海砂層，仍出土不少石片與砍器。若C5P1人骨生前生活於先陶時期，則其死亡後在同層位僅僅下挖20公分即葬下，並不合理。從其葬姿為盤腿盤手而坐，埋葬深度亦需超過20公分。淺層埋葬易受動植物侵擾，後來的繩紋陶人也不可能無視。李作婷曾指出C5P1墓葬的層位問題：「人骨上層的覆土層就當時的生活面而言，實在太淺薄了。加上C5上層因遺物量少而未作文化分層…，則如果層位未有打破現象，則表示人骨當時是放置在地表的淺坑而非向下埋葬，且沒有深厚覆土，這也是少見的墓葬現象。」（李作婷 2004：34）。

此外，根據發掘報告書中的描述：「C5P1於民國77年曾發掘一墓葬。挖掘深度約為120公分時，坑之西角發現三塊砂岩大石材相互堆積……移開砂岩石材，下面為一具人骨墓葬，形態大致完整……姿勢為蹲距葬及用砂岩大石材埋於上方，成為標記」（黃士強、陳有貝 1990：38）。該大石材若被理解為墓葬標記物，與遺體埋葬同時發生，則大石材出土深度約為120公分（如圖1左），處於繩紋陶文化層。因此，應是繩紋陶文化人向下埋葬死者時，打破了先陶文化層。再觀察報告中深度130公分的探坑平圖面（如圖1右），可以看到局部人骨（上肢骨）疑似直接壓疊在大石材上（或緊貼於大石材下方）。以上皆顯示大石材層位與人骨是同一時期。

從層位來看，小馬遺址確實存在先陶文化層，但C5P1人骨應屬於繩紋紅陶人。洪2022文是針對先陶文化層出土貝殼進行碳14定年，數據本身所反映的是地層年代而非人骨年代，若能直接對C5P1人骨進行碳14定年，有機會對該個體生存年代進行最有效的確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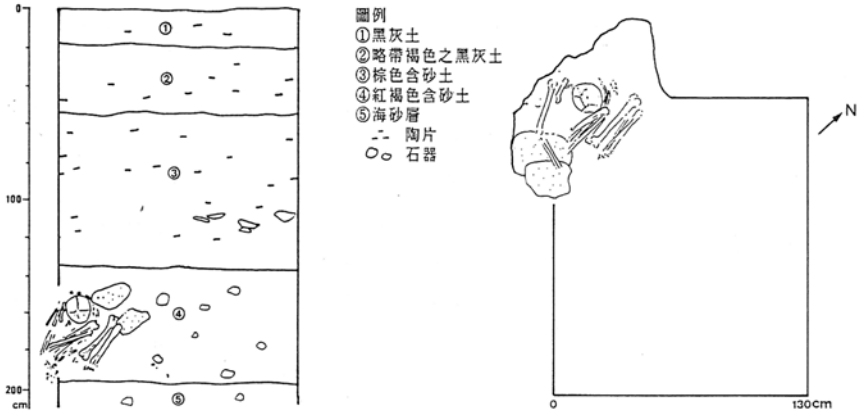

圖1　小馬洞穴遺址C5P1坑西牆斷面（左）、墓葬平面圖（右）（黃士強、陳有貝1990：9）

（二）體質形態與骨病理的疑慮

1. 身高推估論證

洪2022文推估C5P1人骨為女性，身高139公分。文中指出身高的推算由於人骨保存狀況並不理想，於是透過田野紀錄、照片與插圖所得的一個股骨數據35cm加以推算。經由肢骨推估生前身高是體質人類學常見的做法，然而前提是用來推估的肢骨本身本存狀況要相對完好。此外，身高推估原本即有誤差範圍，若用來推估的肢骨存在缺陷，誤差範圍則會更大。股骨長度若差1公分，推估的身高會差2-3公分（Pearson 1899；藤井明 1960；張繼宗2001）。

與出土時的照片進行比對，C5P1人骨可見相當殘破，保存狀況不佳，攸關身高的最大長股骨的兩端部狀況不明。從平面繪圖中未呈現出完整股骨的形態之外，其出土時狀態傾斜，俯視測繪時，圖面尺寸相較真實的長度更短（圖2）。這樣的狀況下，推算由傾斜繪圖而非直接測量所得到的股骨長度，應短2-3公分，推估身高則會矮4-9公分。

再者，不同人群的肢骨與身高比例不同（Trotter and Gleser 1952, 1958；Dupertuis and Hadden 1951），肢骨迴歸推算身高的算式亦有所不同。西方學界廣泛使用Pearson迴歸式，是以法國人為樣本所建立（Pearson 1899），在過去即被指出不適用於非歐洲人群身高推估（Pearson 1899, Stevenson 1929）。

洪2022文中使用的藤井迴歸式，是以27具現代日本女性為樣本所建立（藤井明1960）。藤井迴歸式採用最小平方法進行迴歸，亦曾被指出誤差較大（佐宗亜衣子、埴原恒彦 1998）。輔參中國體質人類學界普遍採用的迴歸式進行身高推估（張繼宗 2001）。若C5P1的股骨果真長35公分，導入Pearson、藤井及張繼宗迴歸式，估算的身高分別為142公分、139公分、142公分（表1），顯示利用藤井迴歸式推估的身高確實最矮。

表1　經由三種迴歸式推估C5P1身高

出處	迴歸計算公式（cm）	身高（cm）
Pearson 1899	2.521×最大股骨長+54.2413=身高±4.56	142.48±4.56
藤井明 1960	身高=2.24×最大右股骨長+61.043 身高=2.33×最大左股骨長+57.841	139.44 139.39
張繼宗 2001	2.75×最大股骨長+45.92=身高±5.00	142.17±5.00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重新計算

即使C5P1人骨139公分的推估為真，這樣的身高也不矮。對比臺灣多個族群1950年代的身高測量值，139公分的個人所在多有。1950年臺東縣卑南鄉大南社魯凱女性平均身高為148.01（n=103, SD=5.26cm）（洪耀德 1960）；1960年屏東縣瑪家鄉排灣女性平均身高148.23（n=166, SD=5.22cm）（廖潤生 1960）。1960年花蓮縣卓溪鄉布農女性平均身高為147.02（n=96, SD=4.19cm）（謝博淵 1960）。鄰近非南島語族的琉球波照間島，女性平均身高為147.44（n=148, SD=4.65cm）（永井昌文 1954）。

理論上，標準差（SD）是指常態分佈下，組內個體數值間的離散程度。與平均值相比，個體數值在一個標準差、二個標準差之內的分佈百分比，為68.27%及95.45%。例如大南社魯凱女性在1950年論文中測有103人，其身高分佈應接近常態分佈，平均身高為148.01公分，標準差5.26公分，表示一個標準差之內142.75～153.27公分之間的分佈百分比只有68.27%，二個標準差之內137.49～158.53公分的分佈百分比則是95.45%。也就是說，139公分在大南社魯凱女性中，二個標準差之內即存在。同理，139公分在瑪家排灣女性、卓溪布

農女性、琉球波照間島女性身高分佈中，都存在於二個標準差之內。由此，再次凸顯偏用孤例推論群體關連性的錯誤。

圖2　C5P1墓葬保存狀況不佳且出土角度傾斜（陳有貝提供）

2. **病理論證**

小馬C5P1墓葬於當年出土後，人骨並未提取清修，帶土包覆運回臺大人類學系。洪2022文附圖10也僅公布該墓葬人骨的顱骨清修結果（Hung et al. 2022: 216，figure 10）。該附圖顯示C5P1顱骨全口僅存上顎左右第一門齒、左右第一及第二前臼，其餘牙齒皆闕如。

檢視C5P1存留的門齒、前臼齒，磨耗嚴重，齒冠僅存1/3，缺失的上顎臼齒及下顎齒，齒槽部位皆已閉鎖，顯示是生前脫落。其齒槽吸收的嚴重程度，顯示脫落時間許久，易導致面部型態變化。牙齒長期脫落，將影響食物攝取，導致營養不良所引起的成長阻礙。若是成長期之前牙齒脫落，甚至會影響養分吸收導致身高發育不良。顱骨縫合處已部分癒合，顯示死亡時是成年以上的高齡者。高齡者骨質流失，也會造成身高的萎縮。綜合以上觀察，以此病理表現的個體肢骨推估出的身高作為群體代表，並以其顱骨型態進行群聚分析，更將造成偏誤。

3. 顱骨型態測量論證

承上述病理論證，洪2022文之C5P1為非正常健康個體，研究對象上不足作為母群體代表。此外，此例更存在保存完整度上的缺陷。洪2022文圖10為顱骨修復後照片，明顯可見保存狀況不佳之處包括：枕部最大長區域破損、顱底破損位移、右顱側石膏修復、左顱側破損、左右眼眶多處破損、額顴縫合區破損等部位。以上破損，將導致顱骨型態學上的顱底-前囟高（basion-bregma height）、最大顱寬（max. cranial breath）、眶寬（orbital breath）、眶高（orbital height）、上顏寬（upper facial breath）等測量值失準。對此，該論文表2亦提到，多筆用於群聚分析的顱骨數據並非直接測量，而是間接推估數據（Hung et al. 2022: 217，table 2）。整體而言，修復後的C5P1顱骨變形位移程度無法確認，多處測量點的準確度堪慮，測得數據亦可能失真。

另一方面，以演化圖來呈現群聚分析結果，是利用顱骨測量值推論群體關聯性的常用方式。要能夠有效推論，必須選擇有效的比較群體。C5P1人骨毫無疑問是出土於臺灣，但洪2022文附圖11選擇了極大量「非臨近」地區人群的顱骨測量數據當對比樣本，繪製演化圖（Hung et al. 2022: 218，figure 11）。即使運用了亞洲人群對比樣本，也是東北亞、西南亞人群居多，少有東南亞人群入選，甚至完全沒有任何現生臺灣人群入選。未有現生臺灣人群入選對比樣本，即無法排除C1P5人骨與現生臺灣人群之間具關聯性。

4. 儀式性拔齒論證

儀式性拔齒，是論證小馬人骨與「尼格利陀人無關」的關鍵證據之一。藉由洪2022文中圖10照片的檢視，可以發現C5P1人骨明顯缺了「上顎左右對稱的第二門齒以及犬齒」，作者對儀式性拔齒的辨識上可能有問題。然而，洪2022文中並未指出C5P1人骨具有儀式性拔齒行為，倒是指出C5P1的上層出土了另一具人骨（C10P1），上顎有對稱性缺齒，洪2022文認為此人骨具有臺灣新時代早期的儀式性拔齒，中文翻譯如下：「該人骨生前生活於新石器時代，被施以儀式性拔齒，而此行為普遍存在於中國大陸、臺灣、東南亞、大洋洲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人。」

另一篇洪2023文中，則明確指出

> 完成修復測量後，松村博文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著小馬出土的頭骨，微笑而淡定的說：『Yes!』這是我們首次獲得科學數據來支持推測。小馬洞人骨屬於一具成年女性，這位成年女性並沒有史前南島族群常見的拔牙習俗。」（洪曉純 2023：66）

換言之，即C5P1人骨「沒有儀式性拔齒」。然而，檢視同頁中的圖四，以及洪2022文的圖10（Hung et al. 2022: 216），可以發現C5P1人骨明顯缺了「上顎左右對稱的第二門齒以及犬齒」。此缺齒模式與臺灣新石器時代拔齒習俗的模式完全一致。而此關鍵性證據，在洪2022文中「完全未提及」，而在洪2023文斷言沒有拔牙，也未說明如此吻合的缺齒模式如何判別為沒有拔牙習俗。

過去的考古研究發現，臺灣新石器早期開始有拔齒習俗，並延續至近代原住民族，拔齒形式以左右上側門齒與犬齒為主（Kinaston et al. 2020，邱鴻霖2011）。相對的，菲律賓尼格利陀人的相關文獻中，皆未曾有儀式性拔齒的紀載。東南亞尼格利陀人或以涅齒、鑲釘、或缺削齒冠進行牙齒毀飾（Endicott 1979, Zumbroich 2010），並無儀式性拔齒習俗。舊石器時代的儀式性拔齒在全球視野下，僅見少數個體前方齒列因工具性使用導致斷裂，難以判定是儀式性的拔齒行為（Merbs 1968, Milner & Larsen 1991）。因此，小馬C5P1人骨上觀察到拔齒，顯示非舊石器時代人，也與尼格利陀人不同。

（三）古環境論證

學者基於緊鄰臺灣的菲律賓有現存尼格利陀人，不免懷疑自古以來的關係，但究竟是延續自更新世時期的巽他古大陸（Sundaland）的人群交流，還是全新世以後才直接來到臺灣，或是在原鄉已混過血才來到臺灣，抑或是臺灣根本沒有尼格利陀人曾經存在。上述假設，目前都沒有科學上的確證。從已知考古學資料，在距今六千年或更早之前的巽他古大陸期（末次冰期的陸連時期），史前時代尼格利陀人在東南亞地區的發現與分布狀況，目前並不明確。

參考鹿野忠雄於1933年所提出的生物地理界線「新華萊士線（Neo-Wallace's Line）」，在更新世的冰期期間海水面下降，與亞洲大陸陸連的臺灣，生物相和西邊的亞洲大陸較為接近，而菲律賓動物相則與南方、東南方的蘇拉威

西與新幾內亞較為相近，並以蘭嶼作為界線（鹿野忠雄 1933a, 1933b, 1933c, 1933d）。再根據澎湖海溝所打撈的更新世晚期動物化石，也顯示臺灣與亞洲大陸東南地區的動物組成相似（何傳坤等 1997；胡連榮 2005）。

從古環境背景及生存年代進行假設性推論，若尼格利陀人確曾來到臺灣，第一種可能是，自最後一次冰期巽他古大陸的陸連時期就來到臺灣。換言之，尼格利陀人從距今三萬到一萬兩千之間的舊石器時代以來即生存於臺灣，而進入全新世海水面上升，臺灣島嶼化，這群尼格利陀人被孤立生存於臺灣直到距今六千年前滅絕。然而，已知臺灣進入全新世後的距今一萬兩千年到六千年前，有長達六千年的人群空窗期，期間沒有人類存在的跡象，因此沒有證據可以支持上述假設。

此外，若尼格利陀人是從東南亞向北移動到達臺灣，由於臺灣與菲律賓在更新世冰期並不陸連，必須經過巽他古陸東岸或南海古陸沿岸，數千年期間的人群長距離移動與混血，無法預期抵達臺灣後，還能保有多少尼格利陀人的生物遺傳特徵會與現代的菲律賓尼格利陀人相似。

另一種可能是，在全新世海水面上升，臺灣島嶼化後，尼格利陀人在距今六千年前航海抵達臺灣。可以設想，菲律賓與臺灣之間有巴丹群島和蘭嶼可以跳島航行，然而目前巴丹群島到蘭嶼一線上的考古遺址中，也尚未發現古代尼格利陀人存在的蛛絲馬跡。更何況，巴丹群島最早的史前文化相（Sunget Phase）也僅距今約3,500-2,700年，其文化反而是受到臺灣卑南文化的影響（Bellwood & Dizon 2005；Hung 2004）。換言之，周邊島嶼的考古證據，目前無法支持尼格利陀人跳島航海抵達臺灣的假設。

四、結論

綜上諸多證據論證以及邏輯推理，本文不支持以小馬洞穴遺址C1P5人骨孤例，來推斷臺灣曾有尼格利陀人群居住，甚至以此論證原住民族傳說小黑人真實存在。

小馬洞穴C5P1人骨，確實是臺灣考古學重要的研究對象，不同學者都可以提出各自的假設，但對於所有的假設，絕對需要嚴謹的邏輯推理及證據論

證，才能做出有效的推論。針對尼格利陀人是否生活於臺灣並與菲律賓尼格利陀人有關的命題，應先嘗試回答尼格利陀人最早在菲律賓出現的明確證據與年代。研究臺灣傳說小黑人是否屬實，同樣的也應真實發掘出年代與考古脈絡清晰且多例的尼格利陀人骨，進行體質及遺傳研究的重複驗證。到那時才能對C5P1人骨各項假說的真實性，做出有效推論。洪2019、2022、2023文所做推論內容皆無法通過邏輯推理與證據面的驗證，更借用傳說文本來合理化科學問題，此非嚴謹科學研究的妥適作法。

參考書目

王家祥

1996 小矮人之謎 [The Mystery of the Dwarves]。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Taipei: Taiwan Interminds Publishing Inc.]。

2002 魔神仔 [Mo-sin-a]。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Taipei: Taiwan Interminds Publishing Inc.]。

永井昌文 Nagai Masafumi

1954 琉球波照間島々民の生体學的研究 [Bi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Hateruma Islands in Okinawa]。人類學研究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7(3-4): 304-324。

佐宗亜衣子、埴原恒彦 Saso Aiko、Hanihara Tsunehiko

1998 日本人女性の新しい身長推定式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Estimating Stature of Modern Japanese Females]。人類學雜誌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Japanese Series)] 106(1): 55-66。

何傳坤、祁國琴、張鈞翔

1997 臺灣澎湖海溝更新世晚期食肉類化石的初步研究 [Preliminary study of late Pleistocene carnivore fossils from the Penghu Channel]。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40: 195-224。

李壬癸

1996 臺灣南島民族關於矮人的傳說 [Legends of Dwarves Among Taiwan's Austronesian Indigenous Peoples]，刊於[In]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f 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李亦園、王秋桂編 [Li, Yih-yuan and Wang, Chiu-kui, eds.]，頁576-604 [pp. 576-604]。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Taipe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李匡悌

2004 恆春半島史前石板屋聚落遺址的空間關係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Relation of the Prehistorical Slate Houses and Settlements in the Hentzueng Peninsula]，2004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報告集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2004]，頁325-355 [pp. 325-355]。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Taipei: 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2006 傳承與斷裂：再看恆春半島史前石板屋遺址的聚落、家屋與人[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visiting Prehistoric Slate House Sites in the Hengchun Peninsula in Relation to Settlements, Dwellings, and Human Activity]。「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五年度第十二次講論會」[The 12th Lecture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6月12日 [June 12]。

李作婷

2004 小馬洞穴發掘與石英質小石器類型研究 [Ty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Quartz Lithic of the Siao-Ma Cave, Taitung, Taiwan.]，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M.A. Thesis.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足立文太郎 Adachi Buntaro

1906 台湾古棲の土人（ニグリトー）について [The Indigenous People (Negrito) of the Ancient Settlement in Taiwan]。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Tokyo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2(249): 83-88。

林瑞珠

2018 臺灣各地的矮人傳說 [The Dwarf Legends from Various Regions in Taiwan]。Ho Hai Yan 臺灣原YOUNG雙月刊 [Ho Hai Yan Taiwan Indigenous YOUNG Bi-Monthly Magazine] 70: 36-39。

邱鴻霖

2011 臺灣史前時代拔齒習俗的社會意義研究—以鐵器時代蔦松文化石橋遺址為例 [The Social Meaning of Ritual Tooth Ablation Behavior in Prehistoric Taiwan: A Case Study at the Shihchiao Site from the Iron-Age Niaosung Culture]。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73: 1-60。

洪田浚

1993 小矮人的石板屋—台灣遠古歷史的活見證 [The Dwarves' Slate Houses—Living Testimony of Taiwan's Ancient History]。臺灣時報 [Taiwan Times]，2月22日 [February 22]。

1994 台灣原住民籲天錄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Cry to the Heaven]，頁 34-39 [pp. 34-39]。臺北：臺原出版社 [Taipei: Taiyuan Press]。

洪曉純

2019 臺灣東部與菲律賓群島的史前人群交流—從舊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 [Anci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Easter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From the Palaeolithic Age to Iron Age]。田野考古 [Field Archaeology] 19(2): 87-116。

2023 史前人骨遺骸研究科學印證臺灣的小黑人傳說 [Scientific Validation of Prehistoric Human Skeletal Remains Affirms the Legend of Taiwan's Little Black People]。科學月刊 [Science Monthly] 641: 62-67。

洪耀德

1960 台湾台東県大南社ルカイ族の人類学的研究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Rukai People in Taitung, Taiwan]。人類學研究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7(3-4): 444-474。

胡連榮

2005 舟山海底哺乳動物化石與古人生存環境 [Zhoushan Sea Mammal Fossils and Ancient Environment]，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張繼宗

2001 中國漢族女性長骨推斷身高的研究 [Stature Estimation Of Chinese Han Female From Long Bones]。人類學學報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4): 302-307。

許勝發

2016 恆春半島石板屋聚落空間形態與歷史發展脈絡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Type and History of the Slate Houses and Settlements in the Hentzueng Peninsula]。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補（捐）助研究生專題研究報告 [Graduate Research Reports Subsidized (Donated) by Kenting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陳光祖 編

2020 臺灣考古學研究文獻書目-2019 [Bibliography of Taiwan archaeology –2019]。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Taichung: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MOC.]。

陳叔倬、邱鴻霖

2024 台湾における原住民人骨の収集および研究の歴史 [History of Collecting and Researching Human Remain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俵寛司譯 [Tawara Kanji, trans.]。東南アジア考古学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43: 99-113。

鳥居龍藏 Torii Ryuzo

1907 台湾の小人はニグリトーなりしか [If the Dwarves in Taiwan are Called Nigelito]。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Tokyo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2(252): 215-219。

鹿野忠雄 Kano Tadao

1932 台湾島における小人居住の伝説 [The Legend of Dwarves Inhabiting Taiwan Island]。人類學雜誌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47(3): 103-116。

1933a 紅頭嶼の動物地理學的研究 1 附ワーレス線北端の問題 [Zoogeographic Study of Hongtouyu with Appendix 1: The Issue of the Northern Endpoint of the Wallace Line]。地理學評論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9(5): 381-399。

1933b 紅頭嶼の動物地理學的研究 2 附ワーレス線北端の問題 [Zoogeographic Study of Hongtouyu with Appendix 2: The Issue of the Northern Endpoint of the Wallace Line]。地理學評論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9(6): 475-491。

1933c 紅頭嶼の動物地理學的研究 3 附ワーレス線北端の問題 [Zoogeographic Study of Hongtouyu with Appendix 3: The Issue of the Northern Endpoint of the Wallace Line]。地理學評論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9(7): 591-613。

1933d 紅頭嶼の動物地理學的研究 4 附ワーレス線北端の問題 [Zoogeographic Study of Hongtouyu with Appendix 4: The Issue of the Northern Endpoint of the Wallace Line]。地理學評論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9(8): 675-701。

黃士強、陳有貝

1990 東河地區遺址試掘及史前文化重建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Donghe]。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 [Commission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mittee]。

楊南郡

2010 踏查半世紀—台灣矮黑人的傳說與調查 [Legends about Vanished Formosan Negritos: Searching for a Half Century]，興大中文學報 [Jornal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0: 1-15。

廖潤生

1960 屏東県瑪家郷住民（北部Paiwan族）の体質人類学的研究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Northern Paiwan Tribe) in Majia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人類學研究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7(3-4): 352-390。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008 [1919]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Vol.6 / Bunun, part I]（原名：武崙族前篇：巒蕃、達啟覓加蕃、丹蕃、郡蕃、干卓萬蕃、卓社蕃 [Original Title: Vonum, part I: Takibanuaz, Takibakha, Takivatan, Bubukun, Takutaban, Takitu'du'], 佐山融吉統編 [Sayama Yukichi, ed.]），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劉育玲
2015 臺灣原住民族矮人傳說研究 [The Study Of The Legend Of Pygmy From Taiwanese Indigenous Tribes]。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謝博淵
1960 台湾花蓮県卓溪村Bunun族の人類学的研究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Bunun Tribe in Zhuoxi Village, Hualien County, Taiwan]。人類學研究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7(3-4): 889-918。

藤井明 Fujii Akira
1960 四肢長骨の長さと身長との関係について [On the Relation of Long Bone Lengths of Limbs to Stature]。順天堂大学体育学部紀要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untendo University] 3: 49-61。

YI 生 YI Sheng
1906 臺灣の土蕃に傳ふる小人の口碑に就きて [Discussing Dwarves in the Oral Tradition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Tokyo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2(249)：101-104。

Bellwood, Peter and Eusebio Dizon
2005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Dispersal. 南島研究學報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1-34.

Chen, Chi-lu 陳奇祿
1968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Taipei: Taiwan Museum.

Dupertuis, Clarence Wesley, and John A. Hadden, Jr.
1951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ature from the Long Bone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9: 15-54.

Endicott, Michael Kirk
1979 Batek Negrito Religion: The World-View and Rituals of a Hunting and Gathering People of Peninsular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ng, Hsiao-chun

2004 A Sourcing Study of Taiwan Adzes.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4: 57-70.

Hung, Hsiao-chun, Hirofumi Matsumura, Lan Cuong Nguyen, Tsunehiko Hanihara, Shih-Chiang Huang, and Mike T. Carson

2022 Negritos in Taiwan and the Wider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New Discovery from the Xiaoma Caves. World Archaeology 54(2): 207-228.

Jinam, Timothy A., et al.

2017 Discerning the Origins of the Negritos, First Sundaland People: Deep Divergence and Archaic Admixture. 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9(8): 2013-2022.

Kinaston, Rebecca Lorraine, et al.

2020 Ritual Tooth Ablation and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Evidence from Eastern Indone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The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17(1): 65-96.

Merbs, Charles F.

1968 Anterior ToothLoss in Arctic Population.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4(1): 20-32.

Milner, George R. and Clark Spencer Larsen

1991 Teeth as Artifacts of Human Behavior: Intentional Mutilation and Accidental Modification. *In* Advances in Dental Anthropology. M. A. Kelley and C. S. Larsen., eds. Pp. 357-378. New York: Wiley-Liss Inc.

Omoto K., et al.

1978 Population Genetic Studies of the Philippine Negritos. I. A Pilot Survey of Red Cell Enzyme and Serum Protein 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30(2):190-201.

Pearson, Karl

1899 Mathema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V.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re of Prehistoric Rac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Containing Papers of a Mathematical or Physical Character 192: 169-244.

Stevenson, P. H.

1929 On Racial Differences in Stature Long Bone Regression Formula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tature Reconstruction Formula for the Chinese. Biometrica 21: 303-321.

Thangaraj K., et al.

2005 Reconstructing the Origin of Andaman Islanders. Science 308: 996.

The HUGO Pan-Asian SNP Consortium

2009 Mapping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in Asia. Science 326: 1541-1545.

Trotter, Mildred, and Goldine C. Gleser
1952 Estimation of Stature from Long Bones of American Whites and Negroe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0, pp. 463-541.
1958 A Re-Evaluation of Estimation of Stature Based on Measurements of Stature Taken during Life and of Long Bones after Death.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6: 79-123.
Zumbroich, Thomas
2010 Gold Work, Filing and Blackened Teeth: Dental Modifications in Luzon. The Cordillera Review 2(2): 3-42.

邱鴻霖
30013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chiu_alex@hotmail.com

Reconsidering whether the Taiwan Xiaoma Site C5P1 Individual is a so-called Negrito or the Legendary "Little Black People"

Hung-lin Chiu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Shu-juo Chen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Since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cholars have debated whether the legendary "little black men" spoken of by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ctually existed. In 2022, Hsiao-chun Hung and others concluded that the legendary "little black men" did exist based on their study of the C5P1 skeleton from the Taiwan Xiaoma site. Using ethnographic data, cranial measurements, stature estimation, and carbon-14 dating, Hung and others argue that the C5P1 skeleton belonged to the Negrito people who lived on the vast Sunda continent approximately 6,000 years ago, predating the Austronesian peoples during Taiwan's Neolithic Age. They believe this evidence confirms the legend amo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concerning the "little black people.". This result has been published in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garnering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public.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at conclusion, reevaluating the evidence to identify flaws in the argument the existence ofand the Negritos or the legendary "little black men in Taiwan" have been proven.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Hung's inference based on both methodological "logical reasoning" and evidence-based argumentation derived from the research subject itself. First,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 term "Negrito" pertains to a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 while

the legend of the "little black people" among various Indigenous tribes in Taiwan lack direct ethnological, linguistic, or archaeological support. Hung's inference, which relies on a singular poorly preserved skeleton, lacks a solid logical basis for connecting it to the historical so-called Negritos, and subsequently to the legendary "small black people." From an evidence-based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burial context, stature estimation,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kull measurements, ritual tooth ab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ritically assess and challenge the conclusions of these widely publicized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 Negritos, legendary little black people, pre-ceramic period, physical anthropology, bio-genetics

Book Reviews

書評

Moral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the Mongolian Borderlands: A Proportional Share. Hedwig Amelia Waters. London: UCL Press, 2023. 189pp.

藍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蒙古邊境地區的道德經濟轉型：按比例分配》一書是屬於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出版社「亞洲的經濟風險」（Economic Exposures in Asia）系列專書之一，2023年出版。這本書透過政治經濟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探討蒙古最東部靠近中國的有著三千名居民的匿名城鎮馬格塔（Magtaal）在後社會主義時期如何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作者將之稱為「道德經濟二分法」（moral economic dichotomies），將此框架作為行動模板，用於判斷將與普遍價值觀相關的商品、社會領域或實踐進行經濟商品化是否符合道德規範。

自1990年代初以來，蒙古開始從社會主義向市場民主轉型，日益依賴國際礦業收入，1997年，蒙古國頒布了亞洲對投資者最友好的《蒙古礦產法》，蒙古國成為國際投資者的一個焦點，引發了採礦許可證爭奪戰。在投機活動、外國直接投資湧入，以及全球大宗商品繁榮週期的推動下，蒙古的經濟成長在2011年攀升至創紀錄的17.3%，建立一個經濟繁榮的新時代，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政府甚至以現金補貼的形式將利益分配給民眾。到2014年，大宗商品週期結束，國際投資者的熱情逐漸冷卻，因為他們擔心蒙古國正在走向「資源民族主義」，導致蒙古國陷入經濟危機。在後繁榮時期，蒙古國已成為一個永久負債的實體，政府從未擁有足夠的資金可同時提供政府服務和償還外債，因此將礦產資源用作臨時資產流，將資金轉移以暫時安撫民眾或避免違約，但卻無法擺脫這種循環。而人民也和政府一樣，生活在一種「以後縫補前縫」（*hoid hormoigooroo urd hormoigoo nöhöh,* to repair the front seam with the

back seam）的經濟環境中，靠貸款生活，且有貸款堆積（*davhar zeel*，double loans/loan stacking），以後債還前債的現象。

三十年過去了，蒙古許多貧困的農村人口覺得自己被主體社會遺忘了，位於中國邊境的馬格塔爾居民發現自己沒有工作，也沒有國家機構，但周圍卻環繞著蒙古最肥沃的草原，野生動物、植物和魚類資源豐富，並且距離中國市場僅有三十公里。一個兩級資源開採的政治經濟體系逐漸形成；雖然大規模、正規、合法的企業集團來到這裡開採石油和土地以獲取國際利潤，但當地居民卻越來越依賴中國資助的非正式、非法的跨境野生生物貿易。邊境對面的中國公民擁有資金和對資源需求旺盛的市場，結果許多小型營利企業紛紛湧現，它們透過非法捕撈當地魚類和採集防風（一種中藥材）銷往中國市場來維持生計，並根據中國市場的需求和容量進行改造。

此外，在從社會主義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許多蒙古人失去了其他物質來源，開始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suljee*，即「網絡」）獲取經濟回報，在馬格塔爾亦是如此。這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結構，利用超越市場的社會聯盟來滿足市場需求，人們根據個人社會政治關係聯合起來以獲取經濟收益，通常會在這些網絡內重新分配部分經濟收益，以持續強化這些網絡。在馬格塔爾，居民將社會關係和自然環境用作金錢回報的潛在來源。網絡形式包括債務網絡與野生生物網絡兩種，二者之所以能夠協同運作，是因為當地居民通常為了暫時的生存而從蒙古銀行借款，之後再用跨境野生生物貿易的收益償還。

由於銀行債務不斷累積的壓力，馬格塔爾當地人越來越以更大的力度和程度將當地野生生物商品化，而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非正式、非法的境外貿易後，導致原有秩序瓦解，也出現了強烈的道德焦慮和質疑，因為個人不再確定什麼是絕對的對錯。在此情況下，逐步形成了道德經濟二分法，以這種行為框架規定參與商品關係在道德上何時是「好」或「壞」，試圖利用當地的道德禁忌來控制經濟流動，從而利用市場貨幣作為媒介，保留和維護當地持有的社會價值觀。這種二分法試圖賦予當地人對其地方行為的某種程度的社區控制權。蒙古人歷來將土地理解為一種「共同財富」，土地創造了各種財富，他們可以利用這些財富來維持整體關係的延續性。居民們從道德角度評判商販的行為，根據他們的行為是否有助於增進當地居民的長期福祉或損害當地福祉，而將其

標記為「有德」或「自私」。而新出現的放債人作為一種職業，在普遍負債的環境下及時提供資金，社會也會根據他們是否被認為幫助當地人解決債務問題或透過高利率損害當地人的利益來標記他們的好壞。雖然在集體土地上對資源的廣泛開採和商品化對環境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但居民認為如果資金繼續以維護當地價值觀的方式流回當地，那麼這種行為就是道德的。當地人透過道德經濟二分法的論述，將生命努力（life effort）、勞動、價值觀等轉化為市場價格計算，並將從其間賺取的金錢再社會化，回歸到當地世界觀，輕鬆地適應了後社會主義時期當地的轉變。由於市場價格的計算並非由當地設定，馬格塔爾的居民在辛苦的環境中，逐步調整其行為和世界觀，以持續滿足這種計算的物質需求，為自己找到一條經濟上可以存活而且自認符合道德價值的生存之道。

作者在緒論中清楚地介紹「道德經濟二分法」的產生背景與具體內容，在結論中提出馬格塔爾對資本主義資源市場的適應是一個持續的雙向生活世界—市場過程（two-way lifeworld-market process），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向下施加物質壓力來向上提取經濟價值。本書正文分為五章，第一章探討當地原有一種受歷史啟發的包容性等級制度治理理想，但這種理想正日益因金錢滲透到國家政治中而受到破壞，當地居民希望重建包容性，將政治經濟關係恢復到能夠代表地方福祉的水準。第二、三章描述了馬格塔爾地區非法但蓬勃發展的防風藥材貿易，以及境內一個湖村漁民之間的跨境非法魚類貿易。防風貿易被設想為一個由眾多蒙古人在多個環節合作維護的整體系統，從而創造一個包羅萬象的財富池。而面對公共資源被市場和政治領導人割裂而來的生存威脅，當地漁民將歷史敘事重新概念化為具體的交換實踐，這些實踐強調的是群體而非個人的積累。第四章指出當地銀行債務的激增，並探討了這如何導致了恩惠經濟（economy of favours）的過熱。因為個人不將債務視為自身責任，而傾向於將其分配給越來越多的家庭成員，這雖然暫時減輕了債務負擔，但卻使他們集體陷入了更加錯綜複雜的關係中。第五章探討了放債人的出現；他們受到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提供的服務使許多當地居民能夠繼續他們多樣的債務循環，維護履行當前對未來做出的經濟承諾，並鞏固了當代道德秩序。透過作者的田野調查、資料蒐集與文獻分析，本書有系統地講述了後社會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對蒙古的掠奪，通過細緻的訪談與觀察深入刻畫了馬格塔爾那些深陷政

治經濟變遷、感到自身被排斥在外的個體的內心世界、道德模糊性，以及新興的集體政治。

本書有札實田野帶來的豐富民族誌細節，有具說服力的理論補充，敘事文字通順可讀，探討蒙古偏遠城鎮在後社會主義時期面對政經困境如何從原有歷史文化價值中尋求適應貨幣市場的生存之道，就此提出了寶貴的見解與理論，是一本傑出的學術專書，值得閱讀推薦。

Untimely Sacrifices: Work and Death in Finland. Daena Aki Funahashi.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3. 222 pp.

顏仕宇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1990s, exacerbat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s a primary trading partner, Finland faced mounting pressure to recover and reposition itself with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European economic order. Amid this recalibration, the Finnish state implemented sweeping neoliberal reforms to facilitate integrat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t was at this juncture that occupational burnout (*työuupumu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object of official concern. Diagnosed as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characterized by exhaustion, cynicism, and diminished productivity, burnout was increasingly problematized not only as a threat to individual well-being but also as a challenge to the national imperativ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Funahashi 2013).

In *Untimely Sacrifices: Work and Death in Finland*, Daena Aki Funahashi interrogates burnout not merely as a category of managerial concern, but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formation embedded in Finland's alienated welfare economy. Drawing on fieldwork conducted in Helsinki and at a rehabilitation center for work-related exhaustion, she offers a sustained critique of the welfare state by foregrounding the paradoxes of moralized care, labor, and refusal across six well-structured chapters. Rather than adopting pathologizing or economistic interpretations, Funahashi theorizes burnout as an existential symptom of governance, an outcome of the ethical overinvestment demanded by institutions ostensibly orientated toward care but structured by the imperatives of productivity and normative labor.

At the core of Funahashi's analysis lies the question of how individuals come to make what she terms "untimely sacrifices"—acts of devotion that persist beyond the temporal and moral horizon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se are not sacrifices demanded by religion or family but by the idea of ethical labor itself, which is the conviction that work should remain socially meaningful and morally worthwhile even whe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at once sustained such meaning have eroded. Workers thus give themselves over to an ideal that is ethically overdetermined, structurally misrecognized, and temporally disjointed. These sacrifices exceed the logic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unfold within the temporal lag between state ideals and the lived contradictions of work in the bureaucratic infrastructure. Her methodological cornerstone is what she calls an "ethnography of the negative" (2023: 31), an orientation toward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toward silence, breakdown, and refusal, not as absences of meaning but as critical sites for theorizing subjectivity and state power. Central to this analysis is a Lacanian reading of the symptom of burnout as a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an articulation of desire that eludes symbolic resolution. In this light, burnout figures not as a failure to cope, but as a surplus of moral investment, a condition in which bodies that are overextended in care get caught in unreciprocated ethical binds and are ultimately abandoned by the institutions that depend on their vitality. The symptom thus becomes diagnostic not of individual maladjustment, but of systemic contradiction. In this regard, Funahashi's analysis resonates with James Siegel's formulation of ideological breakdown as a mode of sovereign expression (cf. Siegel 2000). Profoundly shaped by Siegel's intellectual mentorship at Cornell University, Funahashi's ethnography dwells on the aporias of the state for the excesses they produce and cannot contain, the violence the state disavows yet repeatedly enacts, and the lives it purports to protect yet continually sacrifices.

Chapter One situates readers in the affective and institutional textures of public sector life in Finland. Civil servants engage in bureaucratic care as a moral offering, anticipating recognition, reciprocity, and a shared ethical horizon. What they encounter instead are managerial suspicion, procedural opacity, and the slow erosion of trust. This moral asymmetry, Funahashi argues, constitutes a rupture in the logic of the gift (2023: 40-42), echoing Marcel Mauss's concern with the ethical consequences of failed reciprocity. Yet rather than sparking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or institutional redress, the breach gives rise to affective withdrawal. This analysis dovetails with Rosalind Morris's reading of Jacques Derrida's critique of the performative, where iterability and failure are not aberrations but constitutive features of communicative and ritual acts (Morris 2007: 359-363). Burnout, then, is not a pathological failure but a mode of embodied protest, a quiet negation of betrayed promises (2023: 43-46).

Chapter Two centers on the poignant death of Henna, a civil servant who suffers a fatal, stress-induced heart attack. Rather than prompting accountability, her death is reabsorbed into a national mythos of stoicism and endurance. Through a return to Maussian gift theory and a dialogue with Georges Bataille's concept of the accursed share, Funahashi argues that Henna's death marks a surplus of moral labor that the system cannot metabolize, a form of sacrificial excess that is neither recognized nor reciprocated (2023: 70-75). Henna becomes not only a figure of loss but a spectral presence, a martyred worker in a regime that sanctifies her suffering while evading its causes. Her sacrifice haunts the institutional imaginary in ways that recall Siegel's

writings on phantasmatic statecraft (cf. Siegel 2006), where legitimacy is maintained not through direct representation but through the circulation of haunted figures—witches, enemies, threats—that justify and obscure sovereign violence. Henna's memory is not a wound to be healed but an ungrievable residue valorized in the service of state legitimacy.

Funahashi shifts her ethnographic focus from the continental philosophy-saturated perspective to Pääskynpesä, a rehabilitation center for individuals diagnosed with burnout in Finland. Here, recovery is staged through therapeutic modalities aimed at restoring the individual's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in normative timelines of productivity. Yet, as she observes, the center "articulates the risk of today, thereby foreclosing the need to examine a more fundamental violence—the trauma inherent in the social" (2023: 119). Against the grain of prevailing clinical frameworks that privilege self-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burnout becomes an archive—a site of inscription that both preserves and occludes. The therapeutic encounters at Pääskynpesä expose moments of opacity, instances where exhaustion resists articulation, where language fails, and where the subject is unmoored. She demonstrates how the therapeutic imperative replicates the logic that precipitates collapse, rendering care as performance, recovery a normative demand, and critique folded back into the functionality of care. The subject is compelled to articulate exhaustion in terms that are to be managed, audited, and eventually erased (2023: 104-119). This critique resonates with the Derridean concern, as interpreted by Rosalind Morris, that performative acts are haunted by citation,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failure (Morris 2007: 358-360). Therapy becomes a speech act that fails to instantiate the healing it names. Burnout subjects inhabit a similar bind. They must speak their exhaustion in the grammar of resilience, and any articulation that exceeds that grammar is rendered unintelligible.

In her penultimate chapter, Funahashi turns to the forest (*metsä*), an existential space where Finn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rapeutic ecological imaginaries coalesce. Forest landscapes are configured with moral significance and seen as places of emotional renewal and existential recalibration. Rest becomes a civic duty, and the forest emerges as a fetish object promising authenticity, coherence, and healing. Tracing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Finnishness from Swedish and Russian domina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statehood, Funahashi argues that nature has been elevated as a national symbol and counter-narrative to colonial subjugation and internal stratification. In Derridian terms, ritual often functions not as a resolution but as a containment of crisis, a way to stage coherence at the moment of its impossibility (Morris 2007: 365). The forest, in this analysis, does not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re and violence but re-narrates the displacement of social suffering into an ecological idiom—one that evades critique by invoking moral clarity and national essence.

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of *Untimely Sacrifices* is its commitment to theorizing refusal not as a politics of resistance but as an existential stance. Acts of silence, melancholia, or non-compliance are recast as sovereign expenditures—gifts without return, in the Bataillean sense. These refusals seek neither recognition nor repair; they inhabit the space of negation where meaning and remedy are deliberately withheld. To refuse healing, speech, or reintegration into normative circuits of labor is, for Funahashi, to assert an ethical stance that evades recuperation by the state. Burnout is not a breakdown to be cured but a revel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itself, where the state's own ethics of care turn ironically into the moral abandonment of those who embody its ideals. The ethnography's ethical force lies in its refusal to translate this suffering into coherence. Rather than pathologizing burnout or seeking closure, Funahashi stays with the moments where language falters and subjects withdraw from intelligibility. In these scenes, non-recognition becomes a kind of ironic ethical testimony, a mirror held up to a welfare state that demands moral labor yet fails to sustain the lives that labor makes possible. As Morris (2007: 367) reminds us, anthropological legacies lie not in offering conceptual tools but in their attentiveness to aporia, trace,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resolution. Funahashi's work exemplifies precisely this sensibility: It is an ethnography that listens for meaning in refusal and lingers where redemption is neither promised nor possible.

What makes *Untimely Sacrifices* profoundly resonant for East Asian readers, especially in Taiwan, is its capacity to speak to the moral ironies of endurance and overwork that are often captured in the Sinitic colloquial analogy of "slave mentality" (奴性, *nuxing*), which both condemns and normalizes an internalized readiness to obey, to overperform, and to devote personal well-being to collective or institutional ideals. The discourse historically connotes an internalized disposition that values productivity, emotional compliance, and the moral self-sacrifice cultivated under long-standing regimes of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Confucian social hierarchy, and, more recently, corporate neoliberalism. Seen through this lens, burnout in Taiwan is not merely a symptom of economic overextension but also a culturally charged site where moralized labor, affective obligation, and institutional betrayal converge—echoing, in unexpected ways, Funahashi's account of Finnish moral personhood and biopolitical state infrastructure, in which labor is granted such ethical weight that workers may feel compelled to continue giving of themselves even as the institutions that demand their care withdraw support. Spanning geographies of optimized productivity and psychic lives, we might think, what forms of moral attachment persist when the structures that once promised reciprocity no longer return the care they elicit?

Note:
I am grateful to Dr. Daena Funahashi for the book discussion held during her visiting research stay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of 2024. I also sincerely thank Professor Johan Lindquist for his insightful reflections and encouragement throughout the reading process.

References

Funahashi, Daena
2013 Wrapped in Plastic: Transformation and Alienation in the New Finnish Econom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8: 1-21.
Morris, Rosalind
2007 Legacies of Derrida: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6: 355-389.
Siegel, James
2006 Naming the Wit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e Rope of Go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